

《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阶段性研究报告

未经许可
请勿引用

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

第十四集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多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了真实地、完整地记录共和国农业发展的光辉历程，我室正组织开展“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为了推动该项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我们将陆续编印阶段性编研成果《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广泛征集共和国农业史料，并通过这一方式广泛征求对史实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审核修改意见，以留下科学的信史。

现将陆续编印的《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送上，敬请有关部门、当事人、知情人审核和补充修改，提供重大农业历史事件的知情人、当事人等线索，撰写反映重大农业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纪事本末体文章或亲历的重大农业历史事件的回忆文章，把历史留给后人！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撰写、核校共和国农业史料方面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后人定会感谢您！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回忆王震将军	刘时平 (1)
“文革”初期,周总理二访河北沙石峪	许人俊 (11)
邓子恢“文革”蒙难记	许人俊 (21)
邓子恢副总理在十号大院的故事	许人俊 (36)
王观澜与毛泽东的深情厚谊	许人俊 (43)
新中国土地改革后新富农问题研究	苏少之 (58)
1949—2006 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	武 力 (108)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变迁	黄佩民 (121)
中央农口机构变迁 (1953—1989)	赵 明 (134)
我国天然橡胶事业的艰辛与辉煌	许人俊 (138)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治理边疆的历史考察	李开全 (157)

回忆王震将军

刘时平

在我参加革命后的战争年代，看到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周围，将帅如云，无论在抗日的敌后战场或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那些英雄的革命前辈，都曾以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智慧，出奇制胜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成绩，限于个人经历，对许多老辈的光彩夺目的传奇故事，多是耳闻，并未得机会直接接触向他们学习，所幸的是，我曾在王震将军身边先后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作为和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当时似懂非懂，经过数十年之后，才开始逐步明白，他的要求既实在，又有远大理想，很值得回味，不应忘却。因此，想在年老尚能执笔之时，写出对王震将军的若干回忆，我所写到的事例，也许并非是他历史上重大为人之华，只是由于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事，非常感动，梦寐难忘，对个人教育很深，认为很值得纪念和不断解读、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王震将军率部进入新疆的第一天

我与王震将军相识，是在1949年11月进疆之初。当年8月底，我们解放兰州后未顾得休整，直通河西走廊，到达张掖、酒泉、玉门一线，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新疆和平解放已成定局，10月间，率先进疆的战斗团和先遣部队，已经控制了局面；11月初苏联派了40架运输机的飞机编队，由伊尔库兹克飞抵酒泉机场，支援我军进疆。11月6日早晨，王震同志率领一部分指挥部干部乘苏联飞机从酒泉起飞飞往迪化（后改为乌鲁木齐）。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新疆，宣告了解放大西北的任务胜利结束。那天随同王震将军同机前往的，有一兵团副政委徐立清，参谋长张希钦，王震将军夫人即秘书王季青，第六军军长兼政委罗元发，副军长张贤约，副政委饶正锡。我所在的六军由二兵团改归王震指挥的一兵团领导。饶副政委分工去接管迪化市，要我协助工作，所以我亦同机前往。早晨8时左右，王震将军和所有乘机人员，都按时到达机场。我们到达机场时，飞机正在发动，王震将军穿着一件普通的士兵黄布羊毛大衣，显得特别潇洒。可以看出，在胜利的进军时刻，各首长们心情都异常高兴。在飞机发动和轰鸣声中随便谈论着。这时王震同志大声喊道：“同志们，咱们也站个队，点个名啊！”随着将军的口令，大家在机旁立即以张参谋长为首，站成一个横排。立正、稍息、报数后，大家并未点名，将军高兴地看着熟悉的战友们的面孔，一个一个的过了一下数，我是站在横排的最后一个，将军并不认识我，当即问：“这位同志是谁啊？”未等自己报告，王季青同志即把我作了介绍说：“这是六军宣传部副部长刘时平同志”。将军当即高兴地说：“这样年轻啊？”说的我内心热乎乎的。然后，王震同志挥手登机，飞机就起飞了。那天天气特别晴朗，从舷窗里看到巨大的机翼映着阳光从

嘉峪关上空一掠而过，飞机开始升入高空，机组的苏联同志即从前舱过来客气地打招呼，说：“飞机已升高 3000 米，可以吸烟了。”王震将军点起一支烟站起来凝视前方，首长们也同时高兴的站起身来，展望前方，万里江河，一望无际，他们似在重说毛泽东名句：看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王震将军兴奋地赞叹着：“我们的祖国真伟大呀！”也可能人们早预有考虑，不久，坐下来热烈商讨入疆后，如何开荒、生产、修水利，争取早日粮食自给等问题。那架飞机定员 14 人，对面座位，如同城市的有轨电车，相对面坐，谈论得非常热烈。从这时我就感到王震同志的南泥湾精神，要到新疆大展鸿图了，飞行两小时，又一位苏联同志从前舱过来说：“哈蜜，马上要到了。”哈蜜到了，谈话马上停止，首长们又重新站起来，王震同志注视前方，有所感慨地说：“新疆，过去都说是遥远的边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并不遥远，今后应改为伟大的边疆。”

飞机停在机场后，我从机窗里即看到，数十名身穿各民族服装的代表，来到飞机旁，后面还有许多青年男女，载歌载舞地向飞机拥来，场面异常热烈，在发动机还在排气声中，王震将军和首长们笑逐颜开地走下飞机，和民族代表们一一握手，热情拥抱，和广大群众招手致意。

当天下午，王震同志与各首长和哈蜜地方各界代表人物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并视察了我部队防务，第二天上午 9 时，11 月 17 日，正是苏联十月革命节日，王震同志又率领原班人员从哈蜜登机越过山到达迪化（即乌鲁木齐）受到鲍尔汉主席和陶峙岳兵团司令以及迪化市各民族代表的热烈欢迎，从此，新疆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进程。

二、为新疆各少数民族培养干部

1950 年 3、4 月间，新疆剿匪工作已获全胜，社会安定，新疆省政府已经建立，着手准备社会改革，中共新疆分局决定办一个地方干部训练班，把我从迪化市宣传部长岗位调到该班当副主任，分局副书记徐立清同志为主任（实际上当时徐已到北京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名义上仍兼任新疆的工作），实际上我要负责全校的工作。当时还从第五军（即三军革命部队）政治部调了贾和达（哈族）主任来担任学校副主任。那时工作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很快建立了机构，招生办学，第一期招收各民族学员 300 多人，汉族学员一个队，少数民族学员两个队。当地干班开学不久，有一天王震同志披着一件黑斗篷带着警卫员（人称大个子）到地干班来，一下车就询问办得怎么样？当我向他汇报了情况，说各民族男女学员学习情绪很高，上课认真，都认为到共产党办的学校来学习很光荣等。我说办这件事没经验，三百多人，包括十四个民族，要用汉、维、蒙、俄、哈等多种语言文字上课，要通过翻译。比较困难。王震同志高兴地说：“那就好哇，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彻底解放各少数民族，为人民办好事，这个地干班是培养民族干部的主要阵地，很重要！这个班名义上是徐立清同志为主任，实际上我全管。你是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学校由你管，要

办成像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那样，将来就改为党校，你有什么困难，可直接找我，我不在家时，可以找邓力群同志或张希钦参谋长、曾涤主任，他们会全力支持的……”。我也不知道莫斯科东方大学是什么样子？我就参照延安抗大的办学经验，团结同志全力以赴。第一期300多人，从第二期起，分局和军区决定从驻疆部队抽调300多营团级干部到校学习，作为社会改革的骨干来培训。地干班即改名为分局干校，分为两个部，一部为营、团干部；二部又招收各族青年数百人；第三批训练新疆各中、小学教员，除政治课外，加学文化课；到第四期，经西北局决定改为新疆党校，增设了理论班，专门培养理论干部，还设了新闻班，为新华社和报社培养干部。这里应该说到的是，从第二期起，调来部队营团干部300多人，都带着老婆孩子，甚至有的还带着老母亲，使住宿和生活上产生不少困难，新疆军区按照王震同志的指示都相当优厚的及时解决了。诸如立即拨给干校宿舍若干栋；按部队待遇，拨发了服装；民族学员过节（为库尔班节）军区向全部学员补助肉食和茶、糖等；当地青年男女，性病很多，军区医院负责定期、系统地给予治疗，使此种病在干校得到了基本解决，大得人心；有时当少数民族过节日时，王震同志要我率队前往新疆分局大院去表演歌舞，王震将军亦同时参与，学校的开学或毕业典礼他也参加。男女青年们一同歌舞，以示庆祝，使各族青年衷心欢快和热烈拥护。王震同志重视办新疆党校的行动和当面指示，使我深切感到他那满腔赤胆忠心，革命家无私无畏地胆略，恨不能一天把好事干完的劲头。曾涤同志，邓力群同志也经常亲临指导，或给学员作报告。在他们的热情鼓舞下，我除了自己亲自讲课，作大报告外，并亲自率领各族男女参与修建校舍、打扫积雪、修河坝、拆城墙、打蝗虫等劳动，并冒着零下30多度的寒风到山上拉石头，建成了大礼堂，为的是把学校办成一个使学员具有初步社会主义觉悟，懂得政策，又有联系人民群众的合格学校。因此，新疆党校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

三、任铁道兵司令时，毛泽东给他讲孙中山当铁道总裁的故事

1954年3、4月间，听说王震同志已由苏联治病回京，党中央任命他为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军委副部长。我乃军信通过我的朋友原新华社驻新疆分社社长杜鹏程，向王震将军问候。到4月初，我突然接到一份由王震同志由地方邮局送来的电报，电文曰：“我已和王恩茂和西北局谈好，调你到铁道兵党委工作，望勿推却，并速来京。”4月中旬，王恩茂同志由京回到新疆。一天分局开会后，他把我留下说：“王震同志现在在宝成路勘察，要你立即起身到兰州会合。”于是我即仓促地办理了党校移交手续，带领老婆孩子乘飞机到兰州转道天水与王震将军会合，走马上任。在离开新疆时，我对新疆热火朝天的改革和建设很留恋。我也深深感到，王震同志自解放新疆以来，主持新疆工作期间，率领全疆军民，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民族政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依靠人民解放军，团结改造起义部队，屯垦戍边，建设工业，培养民族干部，节衣缩食，艰苦创业，对新疆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4月下旬，我由兰州转道天水，会见王震将军和铁道兵各首长。当时，王震四十多岁，正精力充沛，他见到我们一家人，很亲切地问候之后，就亲自拉着我那四岁半的儿子咪咪，说：“那我们就到公务车上去吧！”当上了他的公务车后，王震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包间里谈话，他问我：“调你到铁道兵作党委秘书，你看有什么意见？”我表示很愿意随革命前辈到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学习些新东西……。他说：“那就好啊，一个人不能光当老大，有时候也要当老二，……。”当他讲了当前的工作安顿之后，我顿时即感到王震同志工作节奏之快，活动幅度空前的广阔，当时王震同志即挂车到兰州军区去汇报，还要向西北局汇报。他当即交给我起草向西北局的汇报提纲，内容包括宝成铁路北段勘察经过，通车后此地区山货外运、铁道兵到达后的供应，以及动员民工参加修路等问题。这是我在担任党委秘书后所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在公务车上即起草好了。“五一节”前，王震同志即向西北局作了汇报，很受西北局的重视。

在上公务车那天，王震兴致很高，谈起最近毛主席对他的谈话。他对我说：“我到主席那里时，主席正在谈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主席说：‘你翻翻这本书，倒很有意思。这位孙博士辞去临时大总统去当铁道总裁，对铁路建设设想很大。’由此可见，我们今后快些修铁路，对建设社会主义很重要。接着对我介绍铁道兵，说是由解放军的铁道兵团与抗美援朝的铁路新建局的六个师合并组成的，也是与红军第八路军新四军一脉相承的部队。现在回国，还要以战斗姿态，为国家多快好省地修建铁路，咱们今后这多半辈子，就坐这么一个公务车为国家多修铁路啊！”略作停顿，他兴味盎然地讲这次在宝成铁路北段的勘察经过。王震同志喜欢讲历史，他从诸葛亮六出祁山，从这次看诸葛亮出兵的古战道，旁边的张良庙，如何率领李副司令、技术副司令和工程人员一行，深入巴蜀峡谷，过白龙江，跋越秦岭，一路跋山涉水踏地的过程。他说：古人说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时人的思想和技术条件，可能是那么认识，思想感情消极呀。今天我们要以移山填海的精神，用现代装备技术，变天险为通途是可以办到的，时代不同了吆！

到兰州时，当地住户家中桃花伸出墙头，已开始夏天天气了。“五一”前又挂车回西安，“五一”节后，王震和兵部领导人向西北局作了汇报请示，得到了西北局的重视。

5月4日离开西安，到临潼检查了铁道兵的工作，检阅了部队，接着原班人马到武汉参观修建长江大桥工程。那时苏联专家西林在武汉进行技术指导，铁道部队大桥局长彭敏同志在领导建桥工作。我们到时，在开始修桥墩；同时还视察了在那里修建汉江桥的铁道兵部队，随同各领导同志乘小轮船在长江里活动了四五天。那是我第一次到武汉，看到了所谓的山川相缪，烟雨苍茫，以及黄鹤楼的气势，胸襟大为开阔，紧接着即挂车北上，到石家庄检查了铁道兵干校的工作，检阅了学员部队。王震检查工作后，对大楼修得很完备认为不错，但认为铁道兵干部不应在大楼里训练，说住大楼的生活很难适应建筑工地的生活，他主张应把干校的大楼交给地方作医院，干部应拉到施工现场去训练；在干校工作了

二、三天，回到北京，天气已开始闷热，又立即在中南海召开了铁道兵部队庆功大会，朱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

四、遵照毛泽东命令，抢修黎湛、鹰厦铁路，把铁道兵司令部从北京搬到了广西、福建工地

在军委铁道兵初建时，原准备承担修建宝成铁路，后来，毛主席、周总理要求王震改变任务，为了海防建设，要求立即去华南抢建黎北线和鹰厦线两条铁路。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部署，1954年8月5日，王震同志在北京召开了铁道兵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了中央决策，会议还在进行中，立即命令铁道兵部队从西北、东北向华南沿海地区进发，他亲自率兵部各有关领导飞赴南宁，与广西省领导商讨抢建黎湛铁路问题。14日又到黎塘，赶在部队进点之前勘察线路。王震同志从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中，深刻体会到抢建这两条铁路，是中央为了打破美国封锁的一着棋，所以决心很大，为加强领导，准备把兵部机关也搬到了西南工地去。这时碰到了问题，因为铁道兵在朝鲜战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新建的兵种，从领导机关到连队，都有一种建立正规国防军的思想，而部分干部还有一种骄傲自满、不想进取的思想，这个情况与王震将军要将领导机关搬到前线的思想还有距离的。当时各军兵种都在北京复兴路创建了自己的大院，而铁道兵还没有自己修起大院，除司令部机关暂在北京前门里华安饭店办公外，其他机关和家属都暂住在几个大庙里，如圆恩寺、天宁寺等。机关干部正准备建设自己的大院，把生活安定下来，一说要把领导机关搬到前线去，不少人思想不通，风言风语，这些思想反映到领导层，有的说这一来铁道兵司令部不成了游击司令部了吗？有的说司令部在外地，地位就低了，等等。王震同志说：“游击就游击，我们共产党和军队不就是游击出来的吗？论地位，喜马拉雅山地位最高，我们也要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上去。”由于他的思想是正确的和他的威望，经过讨论，还是统一了思想，领导机关很快按照执行了，领导机关全部迁到广西贵县办公。但是还有几十名营团干部，从朝鲜回国后，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北京，在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几个小旅馆住得满满的，正铺开摊子准备享受一下京城生活。在朝鲜战场牺牲奋斗几年回国来同老婆孩子团聚一下也很合理，但他们不回前线，对部队工作影响很大。8月上旬，王震同志又召集这些同志到华安饭店，并说：“我王震请他们来。”王震向他们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抢建黎湛铁路的命令，表扬了他们在朝鲜立下了很大功劳，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脉相承的光荣历史加以鼓励说服，说明美帝国主义还在我们大门口，如果休息下来我们还要挨打、挨原子弹，我这个司令员兼政委，对你们这时候要拉一把，要你们到抢建国防铁路的任务中去建立新功，创造自己的英雄行为。革命干部究竟是革命干部，司令员振臂一呼，受到这些同志的鼓掌热烈响应。王震最后又说：“现在我们统一了思想，我向你们敬礼（鞠了一躬）。”最后与同志们热烈握手告别。一周之后，王震同志为他们专门挂了专车，开赴到了黎湛前线，紧张地投入了施工。

1954年8月中旬，王震又冒着夏天酷暑，乘专用飞机，赶到部队进入工地之前赶到广西，带领部分领导干部到广西省委、省政府商讨修建铁路问题。8月底9月初，工程全面展开，王震提出修建黎湛、鹰厦两条国防铁路，要以战斗的姿态实行“三边”（即边设计、边堪查、边施工），首先他冒着南方夏天的炎热天气，带领部分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当时苏联铁道兵派出一个包括线路、桥梁、场站等专家五人的专家小组，皆系苏联校级军官），先于部队行动，从贵县出发，步行进行实地堪查，每人一顶草帽，王震挽起裤腿，拄一根棍子，与大家一起，跋山涉水，过独木桥，一路确是十分辛苦，专家情绪不高，王震与我们就去给他们加油打气。

王震同志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总是抓紧时间读书和参加劳动，有一次在贵县和我说起读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小说，他说：你看那些苏联同志为了铺设远东输油管战胜西波利亚风雪的精神多么感人，中国的气候条件比他们好得多，难道我们还不如那波特汉诺夫他们吗？他常说，他认为战士们光起膀子在电灯下夜间施工是最美丽的国画。他关心战士干部的生活，常严格检查他们的住地和饮食条件，他鼓励要求干部们与战士尽量“三同”，自己以身作则，常常进入工地参加劳动，在打山洞施工中，他进入山洞中劳动，在沙石乱飞的山洞里，他自己拿起风钻打山洞，他感到打山洞劳动强度太大，即除按施工标准供应伙食物资外，要求另给战士每天加一个鸡蛋增加营养，经常与战士坐在一起征求意见，向他们学习技术。常嘱咐我们说：“你们写文章要多写写战士，不要写我。”

由于王震将军所属部队以战斗姿态抢建，黎湛铁路于1954年9月展开，全长317公里的铁路，经过8个月的拼搏，于1955年7月1日全线通车，全国人民称铁道兵为“祖国铁路建设的突击队”。黎湛铁路通车前夕，王震又率领领导机关于1955年5月下旬由广西贵县移驻福建南平，在那里又开始指挥8个师又一个独立桥梁团以及闽赣两省区12万民兵，投入了抢建鹰厦线的战斗。全线长694公里，仅用了22个月，于1956年12月9日竣工通车。这两条铁路的快速建成，王震十分高兴，他说，这样帝国主义就要老实一些了。

五、视察北大荒，对即将复员的铁道兵战士说：“我这个司令愿意去开荒，你们去不去呀！”

1954年5月份，铁道兵抢建国防铁路的新任务尚未确定之前，王震同志即去黑龙江视察部队。一到哈尔滨，住到国际旅行社，就很专注地看地图，这时他脑子里已经为开垦北大荒作筹划了。当即约来黑龙江省土地局局长房定宸、副局长王世英、省农学院院长刘达（是王在雁北作战时的地委书记）、副院长刘嘉璋（是我在抗大二分校的同事）等，商谈由铁道兵预备官兵开垦北大荒的问题。我记得当时王震同志讲了几点意见：一是据廖鲁言部长说，去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全国每个人不到100斤粮食，还要准备打仗，这如何能行？二是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还不稳定，我们办好北大荒农场一可为援朝部队提供一个后方基地和后方，可以保证前线伤病员有肉蛋、牛奶等供应；三是铁道兵已经

组建起来，任务未定，大批的技术装备（如拖拉机、推土机等）可能修路工程用不了，这就可以用来开荒，工地施工，为铁道兵提供一个技术实地练兵场；四是北大荒地临国家边界，万一有事，还是军垦戍边靠得住一些。当时王震同志的意见，受到了热烈拥护。1955年8月，王震将他的意见报告了党中央。

1956年夏，我正忙于鹰厦铁路的工作，并准备去石家庄铁道兵干校主持那次国家考试时，忽然接到王司令员由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接国务院令，决定由我组成国家农垦部，我正在国务院开会，你到农垦部当政治部副主任，协助我组织复员官兵到北大荒参加农垦事业。”我接到电话后，从石家庄立即赶回北京见王司令员，那时部队已经授衔，我穿着军服佩带着上校的牌子，王司令员非常兴奋地说：“咱们就穿着这身军装带着牌子参加农垦，但这就要转业，我这上将要从每月500多元降到400多，你这上校也要按地方级别降下来，你干不干呀？”我当即干脆地说：“为革命，不是为钱，降多少都可以，坚决去开垦北大荒。”于是就定下来了，立即随他去东单老钱局农业部大楼上班。政治部主任为老红军彭儒老大姐，我为副主任，立即开始了工作。

1956年8、9月间，农垦部成立后，立即筹划开发北大荒的工作。首先是调集干部，建立铁道兵密山农垦局。关于局长人选，铁道兵领导层认为后勤部长王景坤工作扎实，又是牡丹江一带的剿匪功臣，认为较为合适。王景坤原来在朱哲元部队当过兵，大体与我同时从西安到陕北公学分校参加革命的，和我陕公二十五队的同学，记得他是我参加学习后第一个教我打行军背包的人。我对前辈印象很好，因而也向王震同志积极推荐，王震即决定由王景坤为局长。当时铁道兵一些干部向往王震将军开垦北大荒的雄心壮志，也愿意开荒，以后又调了曾做过农垦工作的兵部组织部长霍大儒，副部长王余音等，又会同黑龙江省调了一批干部，如向俊选等，成立了铁道兵密山农垦局。

调了王景坤为头以后，王震同志即叫我、王景坤和保卫部副部长臧永安等，陪他再次考察三江平原。我们在佳木斯租用了苏联人驾驶的江轮作勘察三江平原三角洲的实际踏勘。那时正值洪水期，我们一行由佳木斯出发，到同江口转黑龙江，沿中苏边界而去，再转入乌苏里江，沿江看到一些苏联村庄，看到街上有汽车，感到人家是社会主义，比我们先进多了。沿江还经过一些达呼尔族和朝鲜族渔村，招待我们吃生鱼片，十分新鲜。记得最深的，是到达抚远一带，登上北岸勘察时，大地是一望无边的莽莽草原，草高没膝，人们一接近草原，立即轰起如蚂蚁大的黑蚊子漫天飞舞，遮天盖日，那蚊子似乎有意识地追逐着行人叮咬，我们穿着咔叽布衣服，都被叮得生疼，迫使不得不每人手持两把荆条，边走边赶蚊子。王震将军手持两把荆条，边走边舞，走在前面，别有一种战斗情趣。还到了街津口、勤得利等地方，这里是中国的最东方，是全国出太阳最早的地方。记得到这里时，地方政府从一位采参老人处找到一棵好野参送给王震将军，他将这人参放在衣袋里象吃瓜子一样，随走随吃，结果吃得两天睡不着觉，满有精神，他说：“没想到人参这么大的力

量!”再从江上走了不远，即接近虎林地区。此处江水平明如湖，不时出现大片荷花盛开，真是美极了。

有一次，王震邀了农学院的专家教授，到完达山一带踏勘，用镢头创地，查土壤肥度，和当地老农座谈，老农听说要开发北大荒十分高兴，用新打的鲜鱼和大饼招待王震、教授一行，王震与他们谈笑风生，说：“这里真是棒打獐子瓢勺鱼，野鸡掉到饭锅里”。考察以后，他还请省土地局长王世英同回北京住下来，共同商讨大规模建场开荒的事。

王震同志亲自勘察三江平原时，还到伊春修建森林铁路的 850 部队视察。记得当时正逢大雨，坐吉普在泥泞难走，沿途铺着枕木才能通行。在 850 部队当夜大雨滂沱，森林里的雷声似在铺板下巨响，真是有些骇人。到 850 部队时，正赶上的一部分贵州战士将要复员，王震同志听说，立即召集这部分战士讲话，说：“同志们在这里修铁路很辛苦，立了功，现在要回家了，可是你们贵州农村很穷啊，这里的黑土地，一把能捏出油来，我希望你们去开荒，继续为人民立功，还可保持象现在一样的生活，刷牙还可以用黑人牙膏，我这个司令员愿意去开荒，你们去不去呀”当时战士们热烈鼓掌，于是立即决定调老红军余友清副团长带队，把这些战士集体送到虎林，成立了 850 农场。这是密山垦区第一个农场。

六、任农垦部部长后说：“现在我们又要干南泥湾的老行当了！”

我到农垦部工作后，他曾兴奋地对我说：“现在我们又要干南泥湾的老行当了！”1956 年下半年至 1958 年春，王震同志接收了大批转业官兵转到北大荒去。除调了几个预备师到北大荒外，各军兵种都有官兵转去。这年下半年，我曾奉命到东交民巷的空军大礼堂、沈阳军区部队、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去代表农垦部作过动员讲话，由军委、农垦部和黑龙江省地方，协调这些复转官兵的动员、运输、安置等事，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参加垦荒，成为当时的一种盛事。记得当时王震同志曾提出把农垦部搬到密山，以后因故未将农垦部搬走，实际上各局主要干部是经常去密山的。我就被王震部长派遣，常驻密山蹲点。当时王震同志即对垦区提出一个相当宏伟的计划，除开垦上千万亩的大片荒地外，还要建设密山到虎林的垦区铁路，成立密山汽车修配厂，机械修配厂，各种副业加工厂等。并通过乌兰夫同志，从内蒙要了 1500 头牛羊，运至密山、虎林等地，以补充部队生活所需。他还要求垦区新到部队建干打垒的住房等等。到 1958 年 4 月 12 日，天天有一专列火车，运送成建制的官兵到达。记得在密山车站附近，王震将军穿着上将军装在主席台向一万多名官兵发表热情讲话，身着军服和头围红绿头巾的男男女女，在充沛的阳光下群情激动，誓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呼口号声此起彼伏，极一时之盛。记得我看了此景非常激动，当时写了一首“春到密山”的诗发表在 1958 年第 5 期“中国农垦”杂志上，记得郭沫若写的“向地球开战”的文章，发表在第 4 期上。郭沫若的诗极大地鼓舞了大批转业官兵的士气。此后在北大荒相继成立了 852、853、854 等农场，并扩大开垦两满，在佳木斯成立了合江农垦局，调副部长张林池同志为合江地委书记，领导开垦松花江两岸和黑龙江沿岸地区，使

黑龙江从密山，加上原来的中苏友谊农场至佳木斯等地，连成一片。

1957 年春天，我在政治部分管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我曾到西部人民大学对面的农业杂志社去工作，将杂志社的部分工作接过来。当时搞“机械化农业”杂志的有贾大勤同志等两个人。我与杂志社同志商讨并经请示王震部长，同意将刊名由原来的《机械化农业》改为《中国农垦》。王震部长说请朱总司令题写刊名。这事即由贾大勤去具体操办了。过了几天，朱总司令在一张纸上写了二、三个“中国农垦”的字样，我们从中选了四个字用上了。总之，那年春天，中央领导同志对农垦事很重视。记得，那时朱老总和徐特立同志都到京郊农场看过，都是我陪同参观的。

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艾青、丁玲等在北大荒得到他的保护

王震同志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尽人皆知。1957 年反右时，王震同志接受了北京中央各单位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用一列车送到密山农垦局的农场作了保护安置。当这批人到达时，王震同志自己亲自去接见安排，他告诉当事干部，对这批人，要称同志，要热情地关心他们的生活，表现好的，经过改造，摘掉右派帽子。我记得他如何对待艾青和丁玲。那年有一天，我正随他去牡丹江军马场工作，要吃饭时，听说艾青和夫人高瑛将乘今天的火车经过牡丹江，他就急切地派人到车站想叫艾青来请他吃顿饭，给以安慰和鼓励。去的人到车站一说，车站立即广播：“谁叫艾青，军马场有人找你，请下车”。这时军马场已由军委调拨给密山农垦局，同时也有鸡、猪等饲养场。车站广播大喇叭一喊，艾青大名知道的人很多，各节车里的人都站起来，注视谁是艾青，吓得艾青假装普通乘客，不敢站起来。以后谈起此事，艾青说：“当时我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要站起来，可能被人吃了，所以一动不动地马虎过去。”到了农场后，王震同志把他安置到 852 农场，把他们夫妇安排住到一片树林边上专为首长和客人用的一座用圆木筑的房子里，有内外两间，用木材烧的热炕很暖和，生活很方便，在当时当地，那算很阔气的了。他鼓励艾青在这里好好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写出更好的诗篇。艾青住下来后，生活愉快，有一天，到生产队体验生活，回家时天已晚了，在森林里迷了路，弄不清方向，只听远处有伐木声，艾青就喊：“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同志？”伐木的劳改队随声答到：“我们是劳改”，艾青即说：“哎呀，改同志呀，我迷了路，请来个人带我出去。”大诗人把劳改称为改同志，成了一时的笑话。

丁玲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汤原农场，也是 1958 年夏天。王震同志要我代表他去看望丁玲，负责安置好生活。我到场里一看，场领导对她的生活安排的很好，专门把丁玲和她爱人陈明安排在一个宽敞的院子里，有两间房，院子里跑着许多鸡。我向丁玲同志转达了王震同志慰问之意，丁玲同志非常感激王震同志和党的关心。她说除了看看书报，养鸡外，给同志们上文化课。她向我表示，想到牡丹江养鸡场学习养鸡，于是我给牡丹江饲养场写了封介绍信，介绍丁玲去学习参观。据说她到牡丹江后，受到了很热情的接待。

王震同志所以能保护一些身处逆境的同志，不是偶然的，他对待干部总是热情负责，

政治上严格要求，工作上从全局考虑。而在生活方面，极富有人情味。随他身边工作多年，深有体会。离开他几十年后，忆起往事，等于解读着一本革命实践的大书，我想列举几件事：在反右派运动之前，有一天，郭小川同志来成方街看望王震同志，我在座，郭小川同志向王震同志说，想让我到全国文联当秘书长，王老当即说：“不行，他不能干这个事”，即干脆拒绝了。小川走后，王老跟我说：“你政治上弱，要去和那些文人搞在一起，非犯错误不行。”我当时对他这句话似懂非懂，事后思之，他是从政治上对我负责。

王震同志在新疆时，为了创办工业，宁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从上海等请专家来，给以特别优厚的待遇。他是一位铁路工人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但许多著名知识分子是他的知己朋友，除艾青、丁玲外，作家周立波、科学家华罗庚，50年代的青年作家郭小川、杜鹏程、闻捷等，都是他常来常往的交心朋友。60年代经济困难时，王震让农垦部给科学院的科学家送去粮食和肉食补贴。还请一些作家到南方的农场去休假，实际上是为他们改善一下生活。

1959年后，安徽领导人曾希圣同志听说北大荒聚了大军队干部和技术人才，要求支援，王震立即表示可以支持。并对我说，你再次带头到安徽怎么样？这样，我到了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工作，1964年中科院又调我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任党委书记。在此期间，见到王震同志时，他总是提醒我要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你要去的大连研究所是很有实力、很有作为的老所，有些著名科学家在那里工作，郭沫若院长的儿子就在那里工作，要特别注意尊重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老教授，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很有本事，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还说：自己可以不坐沙发，可得要人家坐沙发，虚心向专家请教，夹起尾巴来干，肯定可以搞出成绩来。我听了这番指教后，不胜依恋地向他告别，他显出极欣慰的心情，长时间地紧紧和我握手。

王震同志对同志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许多这类事情，我在其身边感触很深，特别是记得1955年夏天，我在福建修建鹰厦铁路时，接到王震同志一封亲笔信，信上除讲了一些形势要我多搞一些调查研究外，还写下一句：“希望你安心努力工作，到暑假时，我负责把你那大学生（指崔淑民，她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送去前线与你汇合。”这些具体事情，令人感动。我常深思，为什么那么多干部都愿随王震同志在战场上牺牲奋斗，生死不渝，而离开之后，又对他梦寐难忘。他对干部的极端负责又极端关爱，乃是将军独特的魅力所在。

“文革”初期，周总理二访

河北沙石峪始末

——王振扬访谈录

许人俊

1966年前后，我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静悄悄的暗中酝酿，党的高层领导活动频繁，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偏偏此时此刻，远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亲密战友”、“欧洲明灯”——阿尔巴尼亚又派党政高级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农村先进典型沙石峪，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显得更为繁忙。

68岁的周总理，虽然年迈体弱，重病缠身，但受党中央的委托，仍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大局为重，先后两次亲自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前往沙石峪访问。

时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的王振扬，既是访问的推荐和策划人，又是两国领导访问的全程陪同人员。那两次访问是怎么筹划的？缘由何在？如何组织实施的？遇到过什么问题？有些什么动人的故事？王振扬是这一历史的知情人。

王振扬是我的老领导，“文革”前在同一机关工作，“文革”中又在五七干校同劳动、受审查、挨批斗，交往甚多，关系密切，感情笃深。不久前，两人恰好在一起开会，晚间我特意到他住处详细寻访此事。88岁的老领导老当益壮，精神焕发，思路清晰。他打开久已尘封的记忆闸门，滔滔不决地讲述了那两次访问的种种感人往事。

1965年秋，全国农村全面开展“四清”运动，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遵照中央的部署，指派国务院农办、农政领导人张修竹和王振扬带领工作组，到天津武清县农村蹲点，搞四清调查。

1966年初春，河北邢台突然发生强烈地震，热爱人民的周总理立即带领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等乘直升飞机赶往震区视察灾情，慰问灾区人民。随后，周总理又启程前往石家庄等地区，连续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内蒙、山西、陕西等北方八省市农村旱情极为严重，决定全力以赴，亲自领导北方农村抗旱。

一路风尘仆仆刚回北京，忧国忧民、心系华北农村、农民、农业的周总理，不顾旅途劳累，马上主持召开北方抗旱工作会议。分管农业的谭震林副总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指定在武清农村蹲点的王振扬出席会议。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高登榜、农机部长陈正人、城建部长万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和省长林铁等均匆匆赶来与会。周总理说：

人生来第一件事是要吃饭，要穿衣服；吃饭、穿衣的材料、原料，又都是农村来的，农业问题至关重要。接着，他严肃指出当前北方地区旱情十分严重，不仅影响农村春耕春种，粮食生产形势严峻，辽宁、河北、天津等工业城市，粮食供应也严重不足。经济形势紧张，国务院必须成立抗旱领导小组，既抓抗旱保苗，又抓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协调解决工农业生产危机和城市用水等问题。周总理宣布亲自挂帅，担任组长，指定周荣鑫、陈正人、王振扬等任副组长。

会后，周总理指示陈正人和王振扬两人，先考察河北、北京、天津一带的旱情，然后去河南和西北，必要时可去新疆一趟。总理布置工作很细致，要求工作组每到一地，必须查明旱情程度、当地政府采取什么抗旱措施、工作组的意见如何，一一写成简报，及时报送总理办公室。

任务紧急，刻不容缓，陈正人和王振扬立即带领随员分头行动，南下北上。

王振扬军人出身，年方 49 岁，身材高大魁梧，征战南北，戎马一生。两年多前，他还在广州空军担任政治部主任。1964 年春，毛主席指示全国学习解放军、自上而下建立政治部，加强地方政治思想工作。他被中央军委选调到农业部任政治部主任，后又到中央农林政治部任副主任。长期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雷厉风行、不畏艰苦的作风。转业到地方工作，军人作风依然不减。他身强力壮，精神焕发，身穿一件军大衣，在河北省委农业书记阎达开的陪同下，冒着春寒料峭的刺骨山风，在冀东地区爬山越岭，东奔西跑，一个县一个县的察看旱情。

一天，他们来到遵化县的沙石峪村，了解该村“愚公移山”抗旱生产的经验。

沙石峪村坐落在遵化县长城以南 30 公里的群山之中，原是荒山秃岭的穷山沟，地挂在山梁上“瓢一块、碗一片”，一亩地多则八九十块，少则八九块。附近没有水，要翻山越岭到几里路外去，一担一担地挑。干旱缺水，庄稼难长。好年景时，每人每年也吃不到七八十斤，沙石峪人长期缺吃少穿，受苦受难。全村 80 户人家，有 65 户常年外出打工逃荒。解放后，穷苦出身的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等，领导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组织起来开山劈岭，寻找水源。因不懂科学，历经挫折，劳民伤财，教训深刻，一度灰心丧气。后因上级政府派水利干部帮助勘察，终于在四里外的地方找到了水源。沙石峪人再接再厉，在坚如铁板的石头上，硬是打出了三眼水井，开始有了 10 亩水浇地，从而结束了从山外运水的历史。

后来，张贵顺又带领群众办农业合作社，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开山造田，在北山上用石头垒起了一道道石坝，从山下挑土到山上垫地，先后整出 73 层梯田，造田 43 亩。1954 年寒冬腊月，党支部又组织 37 名党团员成立开山队，由民兵连长带队，开进深山“狼洼”，冒着刺骨寒风，挥舞铁钢钻，开山炸石，挑土造田。火热的气势，感动了群众，开山队伍随即扩大为 100 多人。经过群众四个年头艰苦奋战，沙石峪的土地由原来的 997 亩扩大为

1390 亩，每人平均增加一亩地。集体栽种果树近万棵，还在北山腰凿开了一个长宽各六丈，深三丈，能容水 4800 立方米的蓄水池，为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各级政府也给了他们许多支援，中央农业部副部长、著名的起义将领何基沣，当年考察时就曾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引水用的水管。1955 年，他们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战胜干旱，获得了粮食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 5600 斤余粮，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成了干旱山区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

王振扬等在沙石峪爬山头，看水池，走田地，访村民，对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组织群众“愚公移山”，顽强抗旱的动人事迹感触极深，深为佩服，立即写成简报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随后，王振扬又带领工作组赶到遵化县城东 40 里的西铺村考察。

该村也是山多地少、石厚土薄的穷山村。解放前，因村里拄着打狗棍讨饭的人多，当地人称该村为“穷棒子村”，全村每年都有 30 多人被饿死。50 年代初，共产党员王国藩领导 23 户贫农办合作社，其中有 11 户历来靠讨饭为生，合作社的家产只有“三条驴腿”（另有一条驴腿属于社外单干户），富裕农民称他们“穷棒子社”。但他们人穷志不穷，靠勤劳的双手艰苦创业，开山造地，引水种田，终于摆脱了贫困。1955 年，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主席特意写按语高度赞扬他们“艰苦创业，勤俭办社”的精神。

1965 年冬天，王国藩又带领大家掀起治山治水的新高潮，苦战 48 天，修建了一条长 1300 米的盘山渠道，把水引上岭子山的倒虹吸工程，扩大了水浇地 17.33 公顷。同时修坝阶 350 道，平整土地 16 公顷，还修筑了一条 2 尺宽 6 尺高 140 丈长的护林堤坝。王振扬目睹眼前刚完成的这些巨大工程，既惊讶不已，又无比佩服，也及时写成简报向总理作了报告。

调查组视察了冀东遵化县沙石峪和西铺村后，又驱车南下唐山考察。只见农村到处都在组织群众奋力抗旱，有些农民在山坡上搭着草棚，安营扎寨，冒着刺骨寒风日夜抗旱，吃住都在山上。广大群众热火朝天、艰苦奋斗的施工场面，令人感动。省委农业书记阎达开特意拿着几张农民在山头艰苦抗旱的照片，请王振扬捎给周总理过目。接着又陪同王振扬到丰润县大旺庄，考察农村将玉米秸粉碎成饲料，养猪积肥抗旱夺高产的经验。但当地农机制造厂生产的粉碎机缺少锰钢，硬度不过关，粉碎效率低下。而河北省也缺少锰钢材料，他们希望中央帮助解决。王振扬一一记下，答应一定如实上报总理。

总理对农村抗旱工作抓得很紧，不久召王振扬回京开会，王振扬将河北山区农民奋力抗旱的照片呈总理过目，同时汇报当地农机制造厂制造粉碎机缺少锰钢，恳求中央支援 5 吨。总理当即询问与会的国家计委领导人李人俊：“物资部有没有锰钢可以支援？”李人俊回答：“锰钢虽然是紧缺物资，但只要总理批准，我们马上就给。”

河北的锰钢问题顺利解决后，王振扬又汇报天津市旱情越益严重，市区饮用水供应出现危机，要求北京水库紧急支援。

总理一听分外焦急，立即通知北京市派领导人前来开会磋商。分管农业的副市长赵凡匆匆赶来，总理开门见山问赵凡：“北京水库的水还有多少？能否给天津支援一些水帮助解决困难？”赵凡如实汇报库存水数量虽然不多，但可以立即开闸放水支援天津。在总理的关怀下，河北、天津的两大难题迅速解决。

周总理这种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雷厉风行的优秀品质和工作作风，给王振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鼓舞了他投入抗旱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会后，他遵照总理的指示，继续带领调查组南下河南林县，深入考察农民修筑红旗渠引水抗旱的经验。然后，又转赴陕西、山西考察西北农村的旱情。

王振扬有文化，办事认真，思路敏捷，能说会写，表达能力强，而且写一手漂亮的字。每到一地，他都亲自动手，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及时写成简报，不断报送周总理办公室。

1966年4月初，总理办公室突然召王振扬返京，到中南海西花厅紧急开会。与会人员有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和礼宾司司长等。周总理说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将率党政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他们要求参观我国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因为山西大寨他们过去已参观过，这次不再安排。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多山、少雨、干旱的国家，对方要求参观一个地形、环境、气候条件与他们相仿的的农业生产先进典型。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而阿尔巴尼亚一直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所以党中央十分重视这次访问，周总理亲自主持研究选择参观地点、陪同参观。他让在华北、西北、中原地区长期搞抗旱调查，熟悉农村先进典型情况的王振扬谈谈意见，拿出方案供大家讨论。

王振扬责无旁贷，立即将河北沙石峪、西铺村和河南林县红旗渠的情况，向会议逐一作了介绍。他认为河南林县红旗渠工程浩大，气势恢宏，成绩巨大，令人鼓舞；西铺村人穷志壮，白手起家，长期艰苦奋斗，历史悠久；沙石峪地势复杂，发动群众，愚公移山，开山造田，引水种地，战天斗地，粮果丰收。几个典型各有特点，相比之下沙石峪更符合阿尔巴尼亚的国情和参观要求。问题是沙石峪地处山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

总理点头赞同王振扬的发言，认为沙石峪的交通不是大问题，只要选点合适，可以让空军派飞机运送代表团。他同意将沙石峪选为参观典型，因西铺村和沙石峪都在遵化县范围内，总理又指示将毛主席表扬的老典型西铺村也列入参观计划，并指定外交部和总参会同王振扬前往沙石峪和西铺村进行实地考察，做好迎接贵宾参观的各项准备工作。

1966年4月28日，以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搭乘专机如期来访。我国给予很高的礼宾规格，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率领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贵宾，王振扬奉命前往作为中方陪同人员。

长长的迎宾车队直接开到停机坪旁，威武雄壮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列队迎接。阿尔巴